弘一大師的智慧

溫明麗

台灣首府大學講座教授兼院長

The wisdom of Master Hong Yi

掃地亦是修行~弘一大師, 2016, p. 116

Sweeping the Ground is a Kind of Practice~Hong Yi, 2016, p. 116

「長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壺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這是首大家耳熟能詳且至今仍膾炙人口的曲子。原曲出自美國音樂家Jong Pond Ordway的《夢見家與母親》(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中文則由集文學、詩詞、藝術、繪畫、書法、篆刻、戲劇、音樂專長於一身(王魯湘, 2013, 3月6日; 維基百科, 2018)的李叔同(1880-1942)填詞而成。

弘一大師法名演音，出家前的俗名為李叔同，文濤乃其學名。1880年，出生於天津，曾留學日本(1905-1910)，潛心研究美學救國之道。留日前，他曾就讀南洋公學(即今交通大學前身)，是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的弟子；1905年，他於母親去世後，東渡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和音樂學校(東京藝術大學前身)，修習西洋繪畫和音樂，是中國首位引進人體(裸體)寫生的藝術教育家。

留日期間(1906年)，李叔同為了中國黃河水災波及的兩淮(蘇皖兩省)受災難民，在其創辦的《春柳社》發起義演，當年演的名劇乃法國著名作家小仲馬(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1895)於1848年出版之《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小說(Wikipedia, 2018)，並藉此進行募款以賑災(李叔同, 2015; 維基百科, 2018)。當時李叔同反串茶花女女主角瑪格麗特(Marguerite)——一位出身貧寒，隻身來到巴黎當交際花的女子。當次的演出在日本東京樂座相當轟動，李叔同的藝術才能也因此備受日本藝術家的肯定與賞識(Wikipedia, 2018)。更重要的，該次的義演也開啟中國話劇之先河。

日本返國後，於1912年，李叔同曾擔任今浙江師範學院(當時為浙江省第一師範學校)的音樂及美術教師，與教育家夏丏尊(1886-1946)是同事，豐子愷(1899-1975)、劉質平(1894-1978)等音樂與藝術的名人都是他當時在浙江師範學院的學生，也是其在1918年(39歲)於杭州虎跑寺剃髮為僧後，冀望能傳其美學救國衣鉢，代其完成俗世未了宏願的主要門生(李叔同, 2015)。可喜的是，這兩位門生均未辱使命，在此方面有傑出表現，只是是否救了國，就非本文所能評斷者。但是，可以確定的是，李叔同出家後，仍強調「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民初思韻, 2018)，此乃弘一大師將藝術救國提升為「念佛救國」之具體明證。念佛能否救國，也非吾輩得以任意置喙者。然而，李叔同出家為僧的24年間，就是身體力行，嚴謹自律，度化世人，即致力於以佛救國。

一生極具「翻轉」性戲劇效果的李叔同，其生命中的轉折猶如其個人的才學般，既多元、多彩又多磨難。他自己愛做的事，他一件件去作；他自己該承擔的磨難，他也一個個去承受，絕不迴避、不推辭（弘一大師，2016），其一生真可謂波瀾壯闊與蜿蜒曲折兼容並蓄。1942年10月13日，弘一大師圓寂於福建泉州，終年63歲，被尊為南山律宗大師，是律宗第十一世祖，享譽海內外（維基百科，2018）。

出生官宦富豪之家的李叔同，並非如一般世俗想像中的富二代，如「天知嬌子」般被對待，此乃因為其母親並非正室，而是清同治進士李世珍的第三位姨太太，在家族中的地位極為低微，並備受大房欺壓（王魯湘，2013，3月6日；維基百科，2018），因此，李叔同的父親雖然官任吏部主事，辭官後又為天津大鹽商，並兼營銀號，但李叔同五歲時父親便辭世，李叔同母子一家在家族中更失所怙，過著備受輕蔑的日子（王魯湘，2013，3月6日）。復以，李叔同的行為在家族長輩看來總是乖戾不受教，而且一天到晚無所事事，既不喜經商，又不為官，且無視祖制與家規，亦終日沈迷於書畫篆刻和戲劇。此等行徑均不符當時之社會民情和家族期望（李叔同，2015；王魯湘，2013，3月6日）。家族中最了解與認同李叔同的就是他自己的母親，這種「相知之情」也棉密地將李叔同母子的感情融為一體，彼此「相依為命」的鏈結因此更為緊密。

如上所述，李叔同的父親去官後，經營鹽業和銀行業，此兩種行業都是當時具有強大政商背景者方可為之的大行業。照理說，李叔同這樣的富二代，其生活應該無憂無慮；然而，實質上，李叔同的生母在夫家家族中的卑微地位及其所承受的磨難（李叔同，2016），在李叔同幼年成長的心靈中已經深深烙下不為人知的「創傷」。他深深感受到母親的一生不但辛苦，而且極不快樂。李叔同體會母親艱辛度日的「心痛又無奈的情結」，可能成為促使其心中在不知不覺中已更趨向佛的世界。其後，李叔同剃度出家，由俗轉佛，可能亦與此有關。然而，自幼看到自己母親因為小妾的身分，必須「寄人籬下」，看人臉色過日子，不能自主，又得委曲求全，這些心理創傷，在李叔同的稚嫩心中，已深埋了對母親的悲憫和孝敬之情（王魯湘，2013，3月6日）。此可由李叔同熱切渴望東渡留學之行遲遲未果，且直到其母親去世後方成行的事實，可見一斑。

李叔同的家族篤信佛教，自幼的生活早被佛教的氛圍所圍繞（維基百科，2018），李叔同悲憫天下的情懷，恐自其幼時期即已萌生。惟，李叔同自幼志氣高，又有才子的傲骨，對世俗的貪腐和社會的不平都難以容忍。於是，他只好把這份憂國憂民的心思寄予詩詞歌賦、文學戲劇、書法篆刻，以略慰心中苦悶。期間，李叔同亦結識了若干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當時戲園子的名角楊翠喜（維基百科，2018）。

李叔同的母親看到自己唯一的孩子對官僚強奪其所愛—梨園名伶楊翠喜，無法接受卻又無力抗拒的心靈苦悶下導致的鬱悶和鬱鬱寡歡，意志也隨之與日消沉，於是為李叔同擇取芳齡20的天津商之女俞氏與之成親，當時李叔同才18歲（維基百科，2018；王魯湘，2013，3月6日）。俞氏不愧是名門閨秀，既是相夫教子，又溫柔嫻熟而善良，是古代良妻之典範。李叔同一向孝順，雖然並非出自其本意成親，但仍未拂逆母親的心意，與俞氏育有三子，然長子出生後隨即夭折（維基百科，2018）。此李叔同與其第一任夫人在長子夭折後，又有二、三兩子，此說明李叔同與第一任妻子鶼鶼情深？抑或這是掩飾其婚姻生活不快樂的障眼法，尤其是為了不讓母親察覺自己的不快樂。孰真孰假？耐人尋味。

人最強大的時候，不是堅持的時候，而是放下的時候（弘一大師，2016）；所謂「一念放下，萬般自在」是也（弘一大師，2016）。弘一大師（2016）也說，人生就像是旅行，有些人為了輕裝上路，把責任和道義扔下，這是一種錯誤的取捨，可見，李叔同的出家並非單純地為了逃避責任。世人迄今對於弘一大師棄絕塵世，遁入空門仍有不同的臆測，但是，就弘一大師本人的陳述，則是為了追求一種更高、更理想的方式，以教化自己和世人（弘一大師，2016）。一言以蔽之，弘一大師出家的本意和其實質的作法，都見證了其承擔社會責任的願力。

教育部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辦公室(2015)指出,為落實全國各大學實踐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教育部自106年起,啟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鼓勵各大學組成夥伴學校,藉此積極落實大學社會責任。

析言之,大學應走出學術的象牙塔,主動結合社區文化團體和地方政府資源,營造學生對社區的在地認同感,進而發覺或挖掘問題,並共同尋求解決問題的夥伴和策略,俾透過在地優勢之跨域、跨校、跨領域的分工合作及合作參與,協助區域整合,藉由學習和為社會服務的過程,讓學生感受到被社區需要,讓社區「看到」大學對社區整體營造和未來永續發展所推動的師生社會創新,創造出符合在地城鄉、產業及文化發展的新價值。此即21世紀大學的社會責任。

生活於塵世的李叔同立志以藝術救國,弘一大師則以其24年的僧侶生涯,身體力行地以佛救國,兩者雖是塵俗和出世兩大不同的環境,但心智和行動的本質則均在盡一份個人的社會責任。所謂「一個偉大的城市應該有一所偉大的大學」(教育部電子報小組,2017),此言道出,大學應該承擔其社會責任的使命感。

惟大學的社會使命感與其學術研究和化育人才的目標有否牴觸?仍是值得深思的議題,也是眾說紛紜,尚未有定論。舉凡對大學之社會使命抱持正向支持者認定,大學實踐其社會責任,消極地可破除大學自我封閉於「學術象牙塔」的窠臼,又可積極地讓學生的職能培育,能和社會的脈動無縫接軌。當然,最重要的是,隨著資訊社會呈現的地球扁平時代和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大學的學術不應再局限於大學殿堂中,而應該步出大學圍牆,昂首闊步地引領社會的變革和創新。套句李叔同的話,大學是學術的殿堂,所以,大學應「以學術救國」,而步出校園,為社會做出貢獻,即大學以學術救國之具體作法。

相對的,持反對意見者則堅持大學應是學術研究的聖地,並非實踐之實用場域。因此,雖然教育體制乃社會與政治體制的縮影,但是,大學培育出來的人才,毋庸置疑地需要擔負社會公民的責任,然而,此與大學汲汲營營地要求學生進入社區,並勉強學生去認同在地的理念,此兩者間大不相同。大學協助或鼓勵學生走入社區,並提供學生將其所學貢獻社區,也讓社區提供學生做中學的知能轉化機會,原不是壞事,而是學生成長歷程必經的一環。然而,若此社區服務、自我認同和學生專業知能的提升有所牴觸時,則大學就應義無反顧地以豐富學子的專業知能為主,而以服務社區為輔。孰優孰劣?大學又該如何安身立命?

協助學生認同在地,並能被在地認同,此乃大學學習生活化的特色;然而,大學若欲其學生在社會有所作為,有能力服務或引領社會的發展,則大學應讓學生在學習期間好好充實其專業知能,扎實其學術研究和專業知能,同時,提升其智慧心靈,尤其是獨立思考、批判能力和問題解決能力,因此,大學雖不必急於讓大學生實際地「參與」社會,更不宜以強迫的方式,要求學生在求學期間即完全實踐其社會責任。

實踐社會責任是每個人一輩子的事,故,大學或其學生也必須按部就班,先以充實專業知能和提升心靈高度和廣度為要務,學有遺力後,再奉獻社會。再者,終身學習是一輩子的任務,更非一蹴可幾,而大學的社會責任乃每位大學生畢業後必須承擔的天職,其承擔的能力和智慧,則繫乎大學學習的品質與成效。可見,縱令承擔社會責任是大學的使命,但是,無論政府、學校教師或領導者,均不可揠苗助長,而應循序漸進,耐心培養,循循善誘,此方是正道。

《大學法》第一條,揭櫫我國大學的任務,旨在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但是,該法並未闡明大學這麼複雜而多元的任務是否可以因人而異?是否可以因校而不同?該法亦未指明,大學應以研究學術、培養人才為首要?抑或以服務社會為優先?那麼,大學的宗旨應是學術研究為先?抑或社會服務為

要？

以李叔同的塵世人生與弘一大師出家為僧的生命意義言之，既非孰先孰後的問題，亦非一個「緣」字的因緣際會，而是每個人心中掌握的一把尺。就此言之，大學的社會責任應由大學本身或大學生自己定奪，而非政府的一紙命令或一個政策的制定就為各個大學或大學生決定其學習與生命的何去何從。

綜言之，李叔同甚為重視個人的自由，他不喜歡受到環境或文化的羈絆，而其出世亦是本乎其心之舉。同理，社會責任雖然是大學的使命之一，但是，大學在學術研究與社會服務之間如何取捨，應交由大學自行抉擇，此方是尊重大學學術自主性和其學術研究自由度的表徵。或許如弘一大師所言，「掃地就是一種修行」（弘一大師，2016：116）。掃地不僅僅是淨化環境，更旨在淨化心靈。由此可推，大學生在畢業之前承擔服務社會的責任，也是一種修行——一種淨化心靈、增長智慧的法門。如此，則大學的學術研究與社會服務不再是無法交融的平行線，而是可以有機結合的相交線。

參考文獻

弘一大師（2016）。人生沒什麼不可放下：弘一大師的人生智慧。宋默（整理）。

臺北市：木馬。

維基百科（2018）。李叔同。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5%8F%94%E5%90%8C>

李叔同（2015）。弘一大師文集。取自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310/17/22201879_454100124.shtml

民初思韻（2018）。近代文人—李叔同。取自

<http://www.rocidea.com/roc-20826.aspx>

王魯湘（製作）（2013·3月6日）。鳳凰衛視文化大觀園：揭秘—紅塵內外—

一代奇才李叔同出家之謎。【電視節目】取自

http://phtv.ifeng.com/program/whdgy/detail_2013_03/18/23231685_0.shtml

教育部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辦公室（2015）。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取

自<https://www.iaci.nkfust.edu.tw/Industry/CP.aspx?s=352&n=409>

教育部電子報小組（2017·1月）。發揮在地實踐精神大學耕耘社區營造。教育

部電子報·750·1-5。

https://epaper.edu.tw/topical.aspx?period_num=750&page=2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018). La dame aux Camélias (The lady with the camellias). Retrieved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_Dame_aux_Cam%C3%A9lias